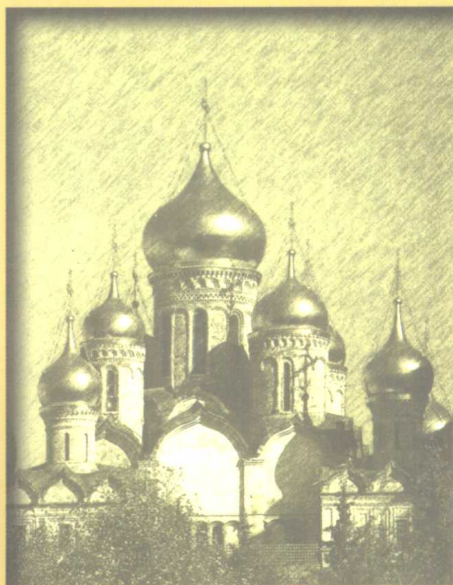


俄罗斯宗教哲学译丛

俄罗斯思想

〔俄〕Вл.索洛维约夫等 著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浙江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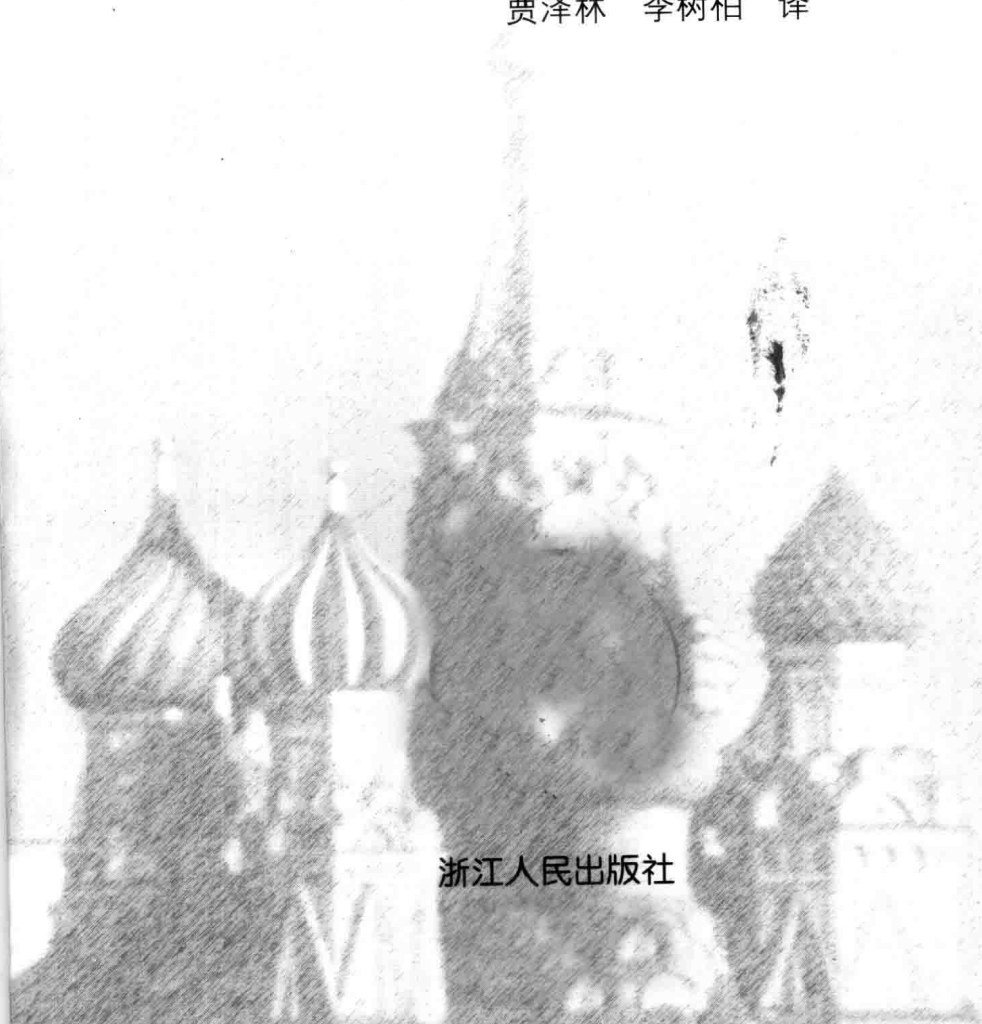
B512
S99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俄罗斯思想

〔俄〕Вл. 索洛维约夫等 著

贾泽林 李树柏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РУССКАЯ ИДЕЯ

根据俄罗斯“共和国”出版社(《РЕСПУБЛИКА》)

莫斯科 1992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思想/(俄)索洛维约夫等著;贾泽林,李树柏译
-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8
(俄罗斯宗教哲学译丛)
ISBN 7-213-02094-3
I. 俄… II. ①索… ②贾… ③李… III. 哲学-研究
- 俄罗斯-现代-文集 IV. B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6024 号

俄罗斯思想

[俄]Вл. 索洛维约夫等 著
贾泽林 李树柏 译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大众美术印刷厂(杭州电厂路)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6 万 插 页 2
印 数 1-4000
版 次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3-02094-3/B·73
定 价 19.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哲学从其诞生伊始,便既是对世界本原的探究,也是对人生意义的形而上学沉思。尽管哲学也随历史发展而改变其外部形态,但它的许多根本问题却万古常新:不同时代和民族的哲学家往往思考共同的哲学问题。人的外在生命与内在精神理想的矛盾,这个哲学问题在两千年后的今天并未改变,甚至更加迫切了。因此,才有中国新儒家的“持守常道”,“返本开新”,也才有俄国宗教哲学家的在现代世界维护信仰,开启人的神性之维。

我们在此选编的这几位著名俄国宗教哲学家的代表作品,虽然具有不同的思想旨趣和叙述方式,但其精神关切是共同的:力图在强大的世俗文明之流中,寻求和确立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只不过俄国哲学家采取了“宗教哲学”的形式。这里,“宗教哲学”一词所指的不是通常所说的以宗教现象为理性哲学思考对象的宗教哲学(Philosophy of Religion),如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而是从某些宗教世界观原则出发来对人和世界进行哲学认识和解释的宗教哲学(Religious Philosophy)。俄国宗教哲学是广义的基督教哲学。

F-242/01

俄国宗教哲学家之所以具有宗教信仰,并且利用基督教概念和形象来解决“生命的精神基础”(索洛维约夫语)这一哲学问题,是有其历史文化根源的。在俄罗斯的基督教-东正教文化背景下,人的高尚性、超越性、精神价值,只能是与上帝观念相联系的。“人同神的关系,与神的联系,是人的本质的决定性特征。使人成为人的东西——人的人性因素,就是他的神人性。”(弗兰克语)这样,经过长期的历史过程,基督教观念和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出了教会范围,甚至超出了宗教界限,而成为一般文化和哲学的因素。

俄国宗教哲学家多受过良好的欧式教育,但他们是欧洲近代文明的反叛者。在中世纪基督教中,上帝观念曾被对象化为人之外的绝对权威,在现实方面反而成为人的桎梏,因此,当近代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冲破了这一桎梏之后,也就随之产生了对人的高尚性、超越性和精神价值的威胁,尼采学说(强力意志)和弗洛伊德主义(人是一团欲望)把这种威胁推向了极致。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哲学家力图证明一种能赋予人生、历史和世界以内在根基和意义的精神实在,为此他们诉诸基督教概念和形象。但俄国宗教哲学不是向传统基督教的复归。它与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的不同在于,它也吸收了西方近代哲学的某些成分。俄国宗教哲学家也不是神学家,因为“纯粹神学家主要依据《圣经》和教会传统,是从信条出发的;而宗教哲学家的认识活动是从自己的宗教体验和信仰出发的”(别尔嘉耶夫语)。

在物质力量决定世界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外部现实领域,这种宗教哲学,乃至一般哲学,总是显得软弱无力,甚至“百无一用”。从这种观点看,宗教哲学是脱离现实的。但俄国宗教哲学家以自己的方式关注着现实——人的心灵现实。他们以“从深处”、“从内向外”的眼光看待世界。在他们看来,人的外部生命存

在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本体论基础”，正是人的心灵。他们坚信，在人的世界上，不是“物质的秩序和关系”决定一切，相反，只有“心灵的秩序”，只有与神相通的“心灵秩序”，才是人的真理、自由和善本身的真正基础和源泉。“现在需要作出最大的精神努力，以便摆脱那控制了人类的无神无信的梦魇”（舍斯托夫语），这正是俄国哲学家所面临的现实。索洛维约夫的“万物统一”，舍斯托夫的“耶路撒冷”，别尔嘉耶夫的“精神”，弗兰克的“实在”，都是他们面对这种现实，对“物质秩序决定一切”的思想反抗，和对“心灵秩序”之终极本原的哲学揭示。而这些哲学努力又与“俄罗斯思想”的文化底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内在联系。

一般来说，“俄国宗教哲学”泛指19—20世纪从宗教世界观原则出发的俄国哲学家（从19世纪40年代的俄国斯拉夫派到20世纪俄国“宗教哲学复兴运动”的代表）所阐发的哲学思想。他们写下了大量有水平的哲学著作，在整个俄国哲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西方世界也有一定影响。有的俄国宗教哲学家还与M. 舍勒、马塞尔、马利坦、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现代西方哲学家有过直接思想交往。可以说，俄国宗教哲学也是世界哲学史的一个篇章。

俄国宗教哲学在苏联曾经长期受到批判。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这些宗教哲学家又成为俄罗斯哲学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广泛关注的对象。我国学界也曾长期对俄国宗教哲学知之甚少，只是近年来，才陆续出版了一些有关“俄罗斯思想”和俄罗斯白银时代思想文化的译著及丛书，涉及俄罗斯文化、宗教、社会思想等诸多方面。我们得到浙江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侧重于哲学方面，继翻译出版洛斯基的《俄国哲学史》之后，又选编了本套以专门宗教哲学为主的译丛。希望这些译作的出版能够有助于我国读者对俄国宗教哲学的系统认识和深入理解。

当然,上述一切完全不是说,这种宗教哲学就代表了唯一真理。和任何一种哲学学说和流派一样,俄国宗教哲学自有在其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下的相对性和局限性。俄国也有同样具有思想价值的无神论哲学家。况且,俄国宗教哲学内部也远非观点一致,而是存在着许多分歧和争论。但这些思想观点都是对人与世界进行哲学认识和理解的一个角度,一种方式。每一个时代和民族都有自己探索真理的方式和走向真理的道路。那么,在这个开放的世界,俄国宗教哲学家对“心灵秩序”的哲学探究也许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俄罗斯,而且能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近现代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文化,为我们民族的精神文化建设,提供一种新的思想参照。

“俄罗斯宗教哲学译丛”编委会

1999年11月7日

中译本前言

“俄罗斯思想”—— 对“立国”和“复兴”的精神支柱的寻求

在新千年到来的历史时刻，我们奉献给国内读者五本俄罗斯哲学家原作的译本。这五本书连同 H. O. 洛斯基的《俄国哲学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蕴含着一个共同的深层主题，那就是有关“俄罗斯思想(或精神)”，有关“俄罗斯思想”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

《俄罗斯思想》是这组以“俄国哲学”为主题的译书的最后一本。这本译书与 H. 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相比，其间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首先，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是一本专著，它有一个副标题——“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这个副标题把他这部作品的主题讲得清清楚楚。别尔嘉耶夫把他所涉及的时间和时间跨度划定得很明确——他叙述的主要是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那段时期的俄罗斯思想家、哲学家们有关“俄罗斯思想”的思想和观点；其次，他这本书的书名，俄文为“русская идея”，而副标题里的“俄罗斯思想”，俄文则为“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идея”

与“мысль”在含义上并不完全相同，“идея”相当于 idea，有观念、理念、思想等意，而“мысль”则是一个纯俄文词，在俄文里它的主要含义是“思想”、“想法”等。在把“идея”与“мысль”译成中文时之所以都译为“思想”，就是考虑到别尔嘉耶夫的上述用法——显然他是从同一个意义上使用这两个词的。至于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俄罗斯思想》，则是一本文集，它收进去的是俄罗斯思想家、哲学家们在不同年代、不同历史背景下、出于不同因由写成的阐述“俄罗斯思想(русская идея)”的单篇文章。这本译书在选材时参考了俄国学界近年来以“俄罗斯思想”为主题出版的多部文集和专著，如 M. A. 马斯林主编的《俄罗斯思想》文集(1992)、《论俄罗斯和俄罗斯哲学文化(十月革命后俄罗斯侨外哲学家文集)》(1990，该文集的第一部分就是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B. H. 萨加托夫斯基的《俄罗斯思想：我们是否应继续走曾被中断过的路?》(1994)等。读原作，比读别尔嘉耶夫和 B. H. 萨加托夫斯基等人写的专著中对这些思想家和哲学家相关思想的阐述要来得更为亲切和原本，有助于了解这些被“解读”、被“叙述”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们自己到底想了些什么和讲了些什么。

所谓“俄罗斯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历史哲学”性质的问题。而所谓“论俄罗斯思想”，具体说来就是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思考和剖析“俄罗斯思想”的含义和意义。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以来，有关“俄罗斯思想”的原作和论著，在俄国大量出版，这既表明当今俄罗斯人对新的精神支柱的渴求，又显示出他们试图从先辈那里获得拯救俄罗斯的灵感和启迪的急迫心情。

“俄罗斯思想”今天已成为全体俄罗斯人关注的焦点，这绝不是偶然的。这个问题与“俄罗斯的命运”即“俄罗斯向何处去”

这类问题直接密切相联。与“俄罗斯思想”相关的问题对任何一位俄国领导人(包括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现在的普金在内)来说都是无法绕过的问题。人们该记得:1996年7月俄罗斯总统竞选期间,叶利钦在一次讲话中曾提出“制定新民族思想(разработка новых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идей)”的任务。叶利钦当时还曾说过:“这”对2000年当选的总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人们对在2000年3月当选的俄罗斯新总统之所以能够胜出,有诸多的议论和分析。其中有一条原因是谁都不会否认的,那就是:新总统符合了俄罗斯历史发展的需要,顺应了民心 and 民意。而从“历史哲学”角度来看,则应该说新总统(无论他自觉还是不自觉、有意还是无意)较好地符合和体现了“俄罗斯思想”的要求。在观察俄罗斯新总统的走向时,看他是怎样对待“俄罗斯思想”这个问题的,应是我们观察俄罗斯未来趋势的重要切入点之一。应当说,这也是破解俄罗斯之谜的一把钥匙。

这里,我们将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分析一下与“俄罗斯思想”有关的种种问题。

“历史哲学”问题(包括“俄罗斯思想”)在当今的俄罗斯,之所以受到格外的重视,显然与俄国当前的严峻现实有关。现实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俄罗斯的生死存亡。

总的看来,俄罗斯当前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有三个,即:

(1)俄罗斯的历史定位:现在处在历史的何处?今后将走向何方?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即所谓天赋“救世观念”在历史上的表现和在当今的表现;

(2)俄罗斯的地理定位:地缘对俄罗斯过去、现在和未来起到的不可忽视的作用,“西方主义”、“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3)俄罗斯的精神定位:俄罗斯存在和复兴的精神支柱——“俄罗斯思想”或“俄罗斯精神”。

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涵盖了“俄国历史哲学”的基本内容。

一、俄罗斯的历史定位

不知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现在处在历史的哪一点(哪个阶段)上,对那个深陷历史茫然之中的民族来说是最大的苦恼和痛苦。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以来的8年,抛开纷繁复杂和瞬息万变的政局和社会风云不谈,综观俄罗斯整个社会的表现,其特点是:(1)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左顾右盼,迷惘惶惑,无所适从;(2)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已被弃置不用,对依据何种理论来认识、理解和判断现今俄罗斯社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又无定见,因此也回答不出“俄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是说,俄罗斯理论界人士现在尚且不能对本国的当前处境作出准确的历史定位;(3)苏俄的历史表明,“历史定位”的迫切性出现在国家和民族遭遇到极为重大的历史变故之时,而且“历史定位”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俄罗斯人几十年里曾一直相信,1917年的十月革命已经解决了俄罗斯的历史定位和方向的问题,从那以后,只要沿着既定的路线和方向走下去就行了。人们料想不到:到了20世纪末,从前有过的“定位”会遭到否定,从前被视为“不可逆转”的前进方向发生了“转向”,20世纪之初曾经作过的选择现在需要从头再作一次。

在重新对本国进行“历史定位”时,俄罗斯人迄今仍摆脱不掉“大国梦”和“救世观念”的纠缠。大国意识和重铸昔日辉煌的愿望仍不见有丝毫的减退。

“莫斯科即第三罗马”与“救世使命”:近年来出版的俄国历

史哲学方面的作品(包括有关“俄罗斯思想”的作品),大都是从谈论“莫斯科即第三罗马”、俄罗斯负有“救世使命”这样一些命题开始的。“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的提法来源于普斯科夫修道院菲洛费伊修士致莫斯科大公瓦西里的一封信(大约在1530年),信中说:“所有的基督教王国都统归于您的一个王国,两个罗马已经消失,而第三罗马却正屹立不动,至于第四罗马则将不会再有。”^①

“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的论点虽然出现在16世纪,且出自教徒,但它却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固有心愿和理想。它从一个方面也反映了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个命题包含着这样一些含义:俄罗斯民族是上帝优选的民族,它将代表上帝在地上行使“救世使命”,它负有重新恢复基督教世界统一和使俄罗斯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政治中心的重任。换句话说,即俄罗斯民族是“天将降大任于斯”的民族。“莫斯科即第三罗马”这一观念为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时期的救世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可以有把握地把它看成是俄罗斯历史哲学的独特开端”^②。

俄国后来出现的“西方主义”、“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从实质上说都与上面的这个论点有关。其所追求的目的都在于使俄国强盛,从而能够实现“救世使命”。有人甚至把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和后来苏联实行的“世界革命”方针都看作是“救世观念”变相起作用的表现。

俄罗斯学者到今天还特别热衷于谈论“莫斯科即第三罗马”这个距今已有460多年的命题,这表明他们绝不甘于被排除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之外,仍想以世界强国的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

① 《古罗斯文献汇编(15世纪末—16世纪前半叶)》,莫斯科1984年版,第441页。

② A. C. 巴纳林:《历史哲学》,莫斯科1999年版,第265页。

“对十月革命”的看法——“选择”与“定位”：俄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定位”发生在1917年十月革命的前后。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共产党人确信，俄国已经一劳永逸地结束了旧社会，从旧帝俄走向了全新的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然而此后的苏联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定位”却越来越失真和超前：1936年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成，1962年宣布20年内进入共产主义，1967年宣布苏联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等等。在苏联时期，苏联舆论界刻意宣传的是“十月革命”和苏联的道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1985年以前，苏联从不怀疑上述结论。1985改革开始之后，才有人对苏联是不是社会主义提出疑问。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否定俄国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否定“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调甚嚣尘上，这实质上既是对俄国1917年选择社会主义是正确的这一结论的否定，也是对把苏联“定位”为“社会主义”的否定。

1997年，在纪念十月革命80周年时，俄国人曾就此发表过各种不同的观点。这些五花八门的观点，反映出俄国人对1917年完成的“壮举”怀有极为矛盾而复杂的心情。其中，彻底否定者有之，完全肯定者也有之。

俄共领导人的观点：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哲学博士根纳季·久加诺夫认为：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特别是在世纪之初。革命不是按“订单”制作的。十月革命是合规律发生的。“俄罗斯-苏联有如当今那个具有自己各种各样问题、矛盾和冲突的世界的模型”。“俄罗斯要比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更早和更强烈地感觉和体验到世界的危机状况”。“俄罗斯所要解决的不仅是自己国内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全世界文明的问题，尽管在这方面它只走了半步，但却先于世界文明，它指出了道路，或

者相反,提醒人们不要步它走错之路的后尘。由此而产生出特有的俄罗斯的弥赛亚观念(救世主说),包括革命的弥赛亚观念。”^①

截然相反的观点: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沙法列维奇和齐普科的看法与久加诺夫的观点针锋相对和截然相反。沙院士认为:“从80年的背景看,十月革命意味着俄罗斯在整个20世纪经历的那一深刻危机的开始。”“这一危机的总的含义是:西方技术文明对俄罗斯的挤压和使俄罗斯从属于自己需要的企图”。在他看来,农民是俄罗斯的积极因素,是惟一能够对抗西方技术文明、长久保持自己传统面目的力量。“而革命则正好是指向于俄罗斯的基本支柱——农民”。“俄罗斯一旦丧失了自己的农民基础,它就只能沦为西方技术文明的附庸。这个国家将具有完全另外一种面貌,在历史上将占完全另外一种地位。”他认为苏联时期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由于把农民逐步地变成大企业的工人而极大地削弱了能够保证俄罗斯长久生存下去的基本骨架”。“在俄国,大企业的建立,与列宁和马克思的预料相反,使得私有化变得容易了,而不是使国有化变得容易了。”由此,他说:“在我国不是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准备了基础,而是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准备了基础。”

齐普科发表的观点更为极端和激烈。他认为首先要弄清现在是在什么情况下谈论“十月革命”和“苏联历史”的。现在是“在俄罗斯国家体制自我崩溃的极端危险的条件下,此时俄罗斯和俄罗斯历史终结的可能性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现在完全看不到摆脱目前恐慌状态的出路”。他认为“当前的民族危机与

^① 参见久加诺夫发表在1997年11月6日《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十月革命的含义和事业》一文。

十月革命及其后果有直接关系”，而且，“从许多方面看，俄罗斯国家体制的危机远比 1917 年的危机要深刻和严重得多。那时，起码到国内战争开始前，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一种文明和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人民尚且能够得到维系。那时许多世纪里形成的俄罗斯生活方式及其思维、信仰和传统还存在。那时东正教的传统还强而有力，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的参与感还旺盛。那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还很活跃，它对俄罗斯感到痛惜，它拥有巨大的精神和智力资本。那时还有俄罗斯农民，俄罗斯商人，俄罗斯市民阶层，俄罗斯工业家”。“那时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准备为俄罗斯战死”。“简单地说，30 年代初，新经济政策结束前，俄罗斯还在。但那以后，斯大林反教会和反农民的斗争，实际上已把俄罗斯连根拔掉了。”“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的极为深刻和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危机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而最重要的是：现在的迷惘，现在的反民族和反帝国的革命”是此前革命的“延续”和“逻辑后果”。在评价“十月革命”方面存在的两种观点（从现代化技术至上角度和从文化与文明角度）中，齐普科说他赞成后面一种观点：“每一民族，每一民族文化，其本身具有价值，维护民族的文化代码，维护其精神独特性要比对农村进行工业改造重要千百倍。”“如果俄罗斯文明是独一无二的和独特的，那么它必定是自满自足的，它必定是有能力自我发展的。”^①

沙院士和齐普科的观点表明，第一，他们都否定俄国 1917 年十月革命所作的“社会主义”选择的正确性，否定把从十月革

① 参见 1997 年俄罗斯作家杂志《我们同时代人》第 11 期（第 6—28 页）发表的该刊编辑部组织的“圆桌会议”的材料，题为《持续了几十年的革命（纪念十月革命 80 周年）》。参加该“圆桌会议”的 7 个人都是当今俄罗斯的著名人物，如俄共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A. 齐普科（他以“批判”斯大林主义而闻名于世）、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И. 沙法列维奇等。

命起到 1985 年以前的历史定位为“社会主义时期”；第二，他们中一个极力肯定俄国的“农民基础”的重要性，另一个竭力强调维护俄罗斯民族“精神独特性”的重要性。

所有上述这些都表明，今天在俄国，不存在“公认”的给过去的俄国和现在的俄国所作的“历史定位”。

历史选择的危险性：而今许多俄罗斯理论界人士确认历史是可以选择的，他们同时还尖锐地意识到今天俄国所应作出的历史选择充满着危险性。俄罗斯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介乎东西方之间的国家，从这种意义上讲，它注定要进行文明的选择，并由此而产生社会历史不稳定性这种危险。”^①“俄国的位置不是牢牢固定在东西方这个轴上。在其历史的每个危机时期，俄罗斯或者顺轴左移，即移向西方，或者右移，即移向东方。如果拿天文学上某些现象作类比，那么它就如同处在两大星体之间，即在两个引力中心之间。俄国既处在这两个中心的作用之下，就怎么也不能稳定自己的轨道，就会产生断裂和分裂其地理政治空间的强大潜能。俄罗斯往往需要超强的整合机制，它们要么以意识形态形式出现，要么以帝国的形式出现，目的都是为了战胜离心作用力。”^②

的确，俄国当前正处在决定其未来方向的十字路口：“从西方模式的自由民主，到披着伪‘共同性’或假欧亚式外衣的民族社会主义，朝哪个方向上走，都是可能的，但其前景却可能截然相反。”^③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就必然带有“危险性”。对俄国来

① 《俄国历史选择达到危险性》（“圆桌会议”材料），载《哲学问题》1994年第5期。中译文见《哲学译丛》1994年第6期，第62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说,这将是一种生死攸关的抉择。

从目前情况看,这种历史选择的“危险性”并未完全消失,不过希望的曙光已经升起。新总统的上台,给俄罗斯人带来了乐观的指望。

二、俄罗斯的地理定位

从根本上把握俄罗斯历史走向的途径之一: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显得异乎寻常地复杂和紊乱,给研究者造成一种无从把握的印象。处于困境之中的研究者,慢慢地觉察到:必须抛开纷繁复杂和瞬息万变的现象,去寻找那些对俄国历史发展起制约作用的根本而又恒久的因素,这些因素不会因政权性质改变和执政者更迭而不再起作用。应当说“地理位置”和“地缘”就是这类因素之一。对“地理位置”和“地缘”对一国存在和发展重要性的认识,是在观察现代世界诸国的剧变之中得出的,研究者进而深感有必要对过去轻视甚至否定“地理环境”重要性的观点加以重新审视。初看上去会以为“地理环境”和“地缘”只是一国的“外部因素”或“外部条件”,跟自然条件没什么区别。实则不然。应当说,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历史从来就是在人造的“第二自然界”中进行的,已不存在纯粹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地理”和“地缘”。相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地理环境”和“地缘”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社会文化、社会历史概念,即一种人文概念。

俄国人对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地缘”特点,早就有所意识和理解。这种意识和理解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同步发生的。“西方主义”、“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同俄国人对自身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地缘”的意